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城乡融合发展的理与路

范根平

(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城乡融合发展是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思想同中国城乡发展实际相结合产生的重大理论创新,是指导新时代我国城乡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这一战略举措摒弃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弊端,充分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优势,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从中国式现代化视域看,城乡融合发展具有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特质。就其内涵而言,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明确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二是强调城乡融合发展既不是要求“城乡均质化”,也不是推动“乡村城市化”,更不是“消灭村庄”,而是在尊重城乡差异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保留乡村特色风貌,让秀美乡村和现代城市交相辉映,共同构建城乡生命共同体,实现城乡共生共荣。就其特质而言,城乡融合发展体现在人民性的本质属性中,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保持强大生命力的关键所在。现阶段,以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必须完善相关体制机制,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多措并举,持续发力,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努力。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城乡融合发展;共同富裕;乡村振兴;人民至上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24)04-0027-10

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城乡融合发展”,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城乡融合发展新时期;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提出,要坚持城乡融合发展……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在长期的探索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以共同富裕为本质要求和显著特征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作为新时代破解城乡发展难题的关键抓手,城乡融合发展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强调“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2]。这一《决定》明确了城乡

融合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重要地位,为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基本着力点。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视域把握城乡融合发展的逻辑机理与实践方略,对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具有深远价值和重要意义。

一、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马克思恩格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点,揭示了私有制条件下城乡对立日益尖锐化的必然性,提出了未来社会实现城乡融合的初步构想。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思想,提出在城乡融合发展中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充分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规定性,同时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对广大人民

引用本文:范根平.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城乡融合发展的理与路[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26(4):27-36.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3KS26);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MKS23201)

作者简介:范根平(1986—),男,讲师,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E-mail:1641135005@qq.com

的郑重承诺。

1. 城乡融合发展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恩格斯在目睹资本主义社会城乡对立愈演愈烈的现状后,批判性地吸收了前人关于城乡结合的观点,进而提出了城乡融合的构想,希冀“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3]308-309}。在他们看来,城乡融合是城乡关系的高级形态,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产物。列宁和斯大林从理论和实践上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城乡融合思想,为社会主义国家消除城乡对立、巩固工农联盟提供了宝贵经验。

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可知,城乡融合发展既是一种理想形态的城乡关系,也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始终把实现城乡融合当作社会主义建设的奋斗目标,以确保城乡关系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乡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但由于种种原因,城乡发展差距仍然突出,这对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构成了阻碍。为此,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旨在扭转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要建立健全有利于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推动实现共同富裕;《2022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提出以县城为基本单元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明确了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城乡建设的重点任务。

党的历代中央领导集体都非常注重处理好城乡关系,这有力地支撑了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早在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就指出:“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4]邓小平也说过:“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5]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旗帜鲜明地提出“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6]38},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途径。由此看来,城乡融合发展不但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而且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彼此统一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2. 城乡融合发展扬弃了西方现代化的弊端

从世界范围看,现代化肇始于西方并由西方长期主导,一度成为“西方化”的代名词。究其原因在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及资产阶级势力迅速壮大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处于主导地位,进而为西方国家走向现代化扫清了制度障碍。正因为现代化最早发生在西方,所以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西方模式似乎成了人类走向现代化的唯一样本。然而,西方现代化建立在对外殖民掠夺和对内残酷剥削的基础上,是资本至上的现代化,是贫富分化的现代化。在资本逻辑驱使下,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而是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大化。从空间上讲,一国现代化有城市现代化与乡村现代化之分,二者是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6]42}西方国家走的是一条“先城市、后乡村”的城市中心主义发展道路,将发展的重心放在城市,由此引发了诸如“城市病”“空心村”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从根本上说,西方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主要是资本积累和资本空间运动的结果。相较于乡村,城市的地理位置优越、生产要素密集、市场发育程度高,因而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重要场所。为了攫取高额利润,资产阶级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从乡村招募了大量劳动力,极为严重地抽空了乡村发展的中坚力量。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过度寻求积累和扩张物质财富的现代化模式忽视了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致使自然环境持续恶化,对人类可持续发展构成严重威胁。在这种情形下,以列斐伏尔、哈维等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学派沉重批判了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生产所造就的空间非正义现象。资本逻辑支配下的城市空间生产日益成为缓解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首要选择,带来了城市中心区衰落、城市治安混乱、城市财政拮据等城市危机的频繁发生,致使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陷入发展困境。

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在城乡建设领域的集中体现,城乡融合发展摒弃了西方现代化所遵循的资本逻辑,其建立在城乡共赢发展的基础上,

既重视推动城市发展,又注重加快乡村建设。这种发展模式秉持整体性与协同性、系统性与结构性的统一原则,不仅克服了西方现代化中个人主义、物质主义膨胀的弊端,而且有助于避免单向度发展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进而推动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随着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广大人民朝着共同富裕迈出了坚实步伐,其中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坚持走城乡融合发展道路,不断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让全体人民收获更多快乐与幸福。

3. 城乡融合发展彰显中国式现代化显著优势

纵观世界城市化发展历程,一些国家出现了大规模的贫民窟,这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贫民窟的生活空间狭小,环境脏乱差,治安状况堪忧,居民缺乏稳定收入来源,很多居民甚至对未来感到迷茫。由于缺少正规的基层管理机制,贫民窟的治理难度大,容易成为犯罪和疾病的滋生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城镇化率从 1978 年的 17.92% 提升到 2022 年的 65.22%^[7],40 多年提高了 40 多个百分点,这是世界上罕见的高速城市化进程。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贫民窟问题。这一成就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紧密依靠党把牢“方向盘”,巧妙地解决了人口众多、百业待兴的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难题,书写了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根据革命形势发展需要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为夺取全国胜利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以提升组织力为抓手,在城市和农村地区发展党组织,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确保了城乡社会安定有序。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率领人民开展农村改革,随后扩展到城市,使得城乡面貌焕然一新。新时代,我们党凭借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8],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

随着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城市人口持续增加,农业人口逐渐减少,这是一个正常的发展现

象。但在中国拥有 14 亿多人口的国情下,无论城镇化发展到何种程度,“农业都要发展,乡村都不会消亡,城乡将长期共生并存,这也是客观规律。”^{[6][44]}加之乡村不仅关系到中华文明的根基所在,还是粮食和主要农产品的生产基地,因此,如何在人口不断迁入城市的同时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成为我们党必须认真思考和回答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把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旨在推动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人们更向往。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把握:一方面,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城市因自身条件吸引了生产要素的集聚,乡村在这方面不占据优势,从而使得城市发展快于乡村,导致城乡发展差距越来越大。从全世界来看,传统现代化进程通常由工业化和城市化主导,这导致许多国家的乡村纷纷陷入“现代化陷阱”,经济增速趋缓,发展后劲不足。城乡融合发展力图突破现有困局,通过城乡之间的互联互通,促进人才、土地、资本等要素双向流动,实现城乡互利共赢。另一方面,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并联式”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等叠加在一起,情况十分复杂,任务极其艰巨,特别是在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推进现代化,其风险和挑战是前所未有的。城乡融合发展着眼于全面现代化建设大局,通过以“融合发展”为抓手,推动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双向对接,以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筑牢基石,凸显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优势,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出“城市兴、乡村衰”的困境提供了新的选择。

二、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城乡融合发展的内涵特质

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城乡融合发展内涵丰富、特质鲜明,必须深刻认识和科学把握,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取得更大实效。

1. 中国式现代化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众多方面,城乡关系作为贯穿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组关系,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

现代化的成败”^{[6]42}。在中国式现代化大棋局中,城乡融合发展是在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并且达到一定程度以后提出来的。据统计,2023年末我国城镇化率达到66.16%^[9],意味着城镇化进程已经进入下半场,背后体现的是社会生产力的快速提升。根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规律,既然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幅提升,那么必须塑造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党中央顺应这一趋势,适时调整优化政策,以“融合发展”塑造新型城乡关系,体现了党对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

基于发达国家的经验,一旦城镇化率超过60%,城镇化速度往往会放缓,这势必会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一定影响。在过去的发展过程中,资源要素大量流向城市,形成了虹吸效应,推动了要素生产率和经济总量的增长。然而,随着城镇化速度放慢,城市的要素集聚能力也会出现明显降低,这意味着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将从单纯的供给侧转向供给与需求双侧驱动^[10]。目前,我国城镇人口已突破9亿人,这个庞大的群体具有强大的消费能力,释放城镇人口的消费潜力有助于解决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供给与需求、投资与消费、速度与效益等结构性问题。与之同时,随着我国城镇化发展进入中后期阶段,必须下定决心、下功夫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等一系列结构性问题。特别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6]43},对正在进行的中国式现代化事业产生了明显的阻碍作用。因此,必须走城乡融合发展这条路,竭力改善城乡发展不平衡现状,补齐“三农”领域短板,更好地满足广大农村居民的需求,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2.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城乡融合发展的合理边界

城乡融合发展不仅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然而,受制于诸多原因,对城乡融合发展还存在一些片面认识和理解偏差,不利于现实中相关决策的推进落实。因此,首先需要充分明确城乡

融合发展的合理边界,才能准确理解城乡融合发展的含义。

其一,城乡融合发展不是“城乡均质化”,而是在尊重城乡差异的基础上促进其互补发展。长期以来,城乡差别被看作现代化道路上的“绊脚石”,对现代化产生了阻碍作用,有些人甚至认为现代化国家应该是城乡无差别或者差别很小的国家,推动现代化建设就应该消除城乡差别。这种观点忽视了城市和乡村在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经济水平、文化特征等方面存在的明显差异,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城乡差别:生活功能型城乡差别和资源机会型城乡差别。从历史上看,城乡差别自城市从乡村“母体”中分离出来便存在,这种差别不仅没有被否定,而且被视为社会多样性的体现。乡村更接近大自然,展现出人与自然的交相融合;城市“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这个事实”^{[3]184},因而城市生活更多反映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模式。当人们厌倦城市的喧嚣时,他们可能会选择去乡村体验宁静的生活;同样地,当农村居民渴望感受城市的繁华时,他们会向往城市生活的车水马龙。因此,城市与乡村之间形成了一种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关系。从这层意义上说,恐怕没有人希望城乡之间的这种差别被抹去,这就是基于生活方式和功能属性不同而产生的城乡差别。基于资源分配和发展机会而产生的城乡差别就是资源机会型城乡差别,因其有违社会公平正义,常常不被公众认可。因此,城乡融合发展并不是要实现城乡均质化,而是要在保留城乡生活方式与主体功能的基础上,弥合二者在资源机会层面的不合理差距,推动乡村与城市的同频共振、相向而行。

其二,城乡融合发展不是“乡村城市化”,而是在保留乡村风貌的同时注入现代元素。在中国,乡村是一种以村落文化为载体的空间形态,经过千百年发展,早已形成了稳定的社会结构,其按照自身逻辑运行。因此,乡村有着自身的“肌理”,这也是其区别于城市的关键所在。自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各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行动,取得了突出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一些地方在乡村建设时,倾向

于依照城市的标准去改造乡村景观,结果是原本的低矮平房被一栋栋洋楼所取代,有的村庄甚至修建了别墅、广场、舞台、文化场馆等建筑,完全失去了乡土味道,与乡村原有风貌格格不入。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绝不是要把农村都变成城市,把农村居民点都变成高楼大厦。”^[11]鉴于此,乡村建设必须走符合自身特点的发展道路,充分尊重乡村内在规律,保留好乡村特色风貌,要看得见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

其三,城乡融合发展不是“消灭村庄”,而是城市与乡村和谐相处。目前,一些地方政府为追求高城镇化率,实行大规模的“撤村并居”“合村并镇”,强迫农民进城落户,在他们看来,这样不仅可以拉动城市消费和促进房地产业发展,还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问题在于,各地城镇既无法为所有进城农民提供稳定的工作岗位,也无法解决他们的教育、医疗、养老、社保等问题,大多数农民的生计来源有限,他们在离开土地后不一定能够找到合适的工作,广大农民随时面临着进城失败的风险。在这种情形下,农村成为农民市民化“碰壁”的唯一退路,因为农村还保留着宅基地、耕地、林地等生产资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他们的基本生存需求,使他们不至于无依无靠。从另一个角度看,“三农”问题实质上是经济问题,长期制约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而要想突破这一瓶颈,不能简单地采取“加减法”,即摒弃某一方面以达到既定目标,而应通过全面发展,快速补齐短板,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

其四,城乡融合发展的本质在于构建城乡命运共同体。尽管城市和乡村在功能景观、经济形态、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但二者是一个相互影响、利益攸关的生命共同体,如城乡之间存在双向污染链,任何一方受损都会给另一方带来严重后果,甚至可能引发灾难性影响。因此,城乡融合发展不应是单方面的“独奏”,而是城乡双方的“合唱”。因此,应当在尊重各自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使城市和乡村在生产布局、生活布局、生态布局等方面各司其职、各担其责,实现城乡深度融合、交互共进,耦合形成

城乡命运共同体。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城市和乡村在身份地位和权利义务上是平等的,彼此不可或缺、不可替代,应当赋予其平等的发展机会和权利。但是,由于历史欠账太多^{[6]33},农业农村依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突出短板。因此,必须优先发展农业农村,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并通过城乡之间的开放合作、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力图打造城乡共生共荣的生命共同体,实现城乡共建共享和人的全面发展。

3. 人民性是城乡融合发展最鲜明的特质

从主体维度看,城乡关系的主体是鲜活的“人”,而不是抽象的“物”,所以,不论是城市的发展还是乡村的发展,理应体现人的价值和需求。但凡任何一种发展,只有不断满足人的需求,全面提升人的素养,塑造内心丰盈、精神饱满、人格健全的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城乡融合发展旗帜鲜明地坚持人民性,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竭诚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扎扎实实为人民干实事、办好事,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充分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鲜亮底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不能只是少数人富裕,而是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2],这一观点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价值取向,即真正有利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新时代,强调人民性意味着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为人民服务宗旨贯穿于一切工作,想人民之所想,忧人民之所忧,真正做到让人民满意。这种人民性的发展理念,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关键所在。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是社会实践活动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现代化国家、如何建设现代化国家,必须植根人民,拜人民为师。换句话说,现代化是属人性的,在这一过程中,人既是实践主体,又是价值主体,更是终极归宿。作为后发国家的典范,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既遵循世界现代化一般规律,又在根本上不同于西方现代化^[13]。西方现代化以资本为中心,资本增殖逻辑构成资本主义生产的主导力量和根本目标,必然带来人的主

体性的丧失。中国式现代化恪守人民主体地位原则,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旨归,真正实现了对人的本质的充分发掘,超越了西方“人为物役”的狭隘现代化,成为人类文明进程中最具代表性的新形态。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开创者、领导者和掌舵者,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的期盼作为我国现代化的着眼点和归宿,引导人民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特别强调让农民群体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以实际行动回应广大人民群众关切。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将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作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关键突破口,不断增强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切实维护和保障社会公平正义,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新期盼。

从深层次来说,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关键在于坚定人民立场,反映人民意愿、维护人民利益、增进人民福祉贯穿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全过程。找准“人民”这一根本圆心,进而形成凝万众之心、汇全民之智干事创业的磅礴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必须深深扎根人民、紧紧依靠人民,全面激发蕴藏于亿万人民中的创造伟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城乡融合发展传承了人民性这一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深刻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进入新时代,为了让农村居民享受更多优质公共服务,党中央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努力使城乡融合发展成果惠及广大农村居民。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建立健全惠及城乡居民的全方位社会保障体系以及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方面的改革,兜牢民生底线,“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14]。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动城乡融合发展,需要牢牢坚守人民性,这既是其成功的奥秘所在,也是其鲜明特质所在。

三、沿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断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实现

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中,要采取多种途径和方式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助力实现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1. 完善相关体制机制,构筑城乡融合发展的坚实保障

体制机制好比城乡融合发展的“总开关”,体制顺,机制活,则城乡兴。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必须加快建立健全相关体制机制,以完善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作为坚实后盾,有效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第一,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涌向城市,这些人中很大一部分为农业转移人口。据统计,2023 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66.16%,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 48.3%^[9],这意味着仍有 1 亿多农业转移人口没有在城镇落户,城镇化质量亟待进一步提升。为扭转这种局面,必须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让有意愿、有能力在城镇落户的群体应落尽落,这要求逐步消除人口双向流动的户籍壁垒,维护进城落户人口的合法权益,让其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切实提升城镇化发展水平。例如,推动出台专门针对进城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障法,从制度层面给予其市民待遇,尤其是在购房、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民生方面提供支持,解开进城务工人员融入“心结”。

第二,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在农村,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资源,近年来,由于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导致很多土地资源被闲置和撂荒。从现代化进程来看,农村人口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是大趋势,在农村人口数量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土地流转同样成为一种趋势。所以,亟需建立健全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政策,实现城乡地权平等交易,有效盘活农村土地资源,释放更多土地红利,让农民的“腰包”更充实。如,在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积极探索实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准则,允许农民按照自愿有偿原则,将闲置宅基地、荒废的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转变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努力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第三,健全推进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新型城镇化注重以人为核心,旨在提升居民生活品质。党的二

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推进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2],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就目前来说,一是要强化规划引领,优化城镇空间布局。科学合理的城镇规划方案有助于统筹人、财、物等资源,“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2]。要围绕规划建设,综合考虑土地利用、产业发展、人居环境、生态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等因素,推动城镇空间内涵式集约化发展。二是要提升城镇功能品质,增强综合承载能力。城镇功能品质事关城镇形象,关乎民生福祉,可从基础设施、生态环境、智慧城市建设等方面推动城镇形态、业态、质态提升:重点实施棚户区、老旧小区和背街小巷改造项目;深入推进农贸市场、停车场、公厕、天然气管网等配套设施建设;加快构建覆盖城乡、功能完备、支撑有力的基础信息平台;塑造城镇品质新面貌,满足城镇居民的多元化需求等。三是制定和完善支持新型城镇化的政策措施,包括财政、金融、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同时要加强部门间协调配合,凝聚起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强大合力,确保新型城镇化稳步推进。

2. 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打造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新发展理念直面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突出性问题,有助于实现跨越式发展。因此,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破解城乡融合发展面临的痛点难点问题,引领城乡建设长效发展。

第一,突出创新引领。创新作为第一驱动力,对经济社会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要突出创新引领,激发乡村发展的内在活力和创新潜力,而这有赖于体制创新。以农业现代化为例,由于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普遍外出务工经商,导致农村现实劳动力和科技水平不断下降。长此以往,必然引起农业劳动力供给结构失衡,进而阻碍农业现代化进程。为解决这一问题,要探索建立完善涉农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鼓励和引导科研机构 and 农技人员到农村开展科技服务活动的同时,不断创新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机制,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第二,注重统筹协调。城乡协调是缩小城

乡发展势差的重要途径,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为提高城乡发展协调性,要推动城乡土地资源管理、产业发展规划、基础设施建设等实现有机衔接,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针对当前农村公共服务设施滞后的问题,一方面要推动教育、医疗、养老、社保等公共服务向农村倾斜,努力让农村居民享受到优质、舒适、便捷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为提升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要在保障服务质量和公共安全的前提下,适当降低基本公共服务市场的准入门槛,允许更多符合条件的市场主体参与进来,通过契约外包、委托代理、公开招标的方式将乡村公共服务交由专业的社会力量承担。如,针对公共绿化、街道清洁等具有竞争性、非营利性的公共服务项目,完全可以委托相关企业或组织承担,政府负责做好监管工作,这样既可以减轻自身财政负担,又可以拓宽农村公共服务覆盖的领域和范围。

第三,倡导开放共享。从长远来看,城市和乡村的发展是相辅相成、密切协作的双向互动过程,必须把城市与乡村连接起来,通过强化城乡之间的沟通与协作,充分激发城乡融合发展活力。在具体操作上,要畅通城乡要素流通渠道,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过去,城乡要素流动主要表现为要素从乡村单向流往城市,导致乡村发展后劲不足,缺乏活力。当前,这种局面虽大有改观,但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仍然存在堵点,要改变这一现状的关键在于打破要素壁垒,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要素市场,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以资本为例,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资本对于繁荣市场经济、激活生产活力、推动社会进步等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无论是城市发展还是乡村建设,均离不开资本的支撑。针对农村地区普遍反映的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等问题,一方面要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不断加大公共财政向“三农”倾斜力度,为乡村振兴提供充沛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要鼓励社会资本入乡投资,继续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促进资金循环流动,有效缓解乡村建设资金不足的困境。

第四,坚持绿色发展。在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坚持绿色发展,就要将绿色标准贯穿到城

乡建设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不仅能丰富城乡融合发展的“内涵”,而且能提升城乡融合发展的“颜值”,建设美丽中国。具体来说,要以落实“双碳”任务为引领,积极开展生态园林城市、低碳城市、海绵城市、“无废城市”建设,加快绿色农房建设和既有农房节能改造,切实提升城乡建设绿色低碳发展质量。要全面促进各类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健全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除此之外,还要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引导全社会积极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共建美丽家园。

3.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厚植城乡融合发展的物质基础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没有高质量发展,就谈不上社会主义现代化。”^[15]要把经济发展这块“蛋糕”做得更大,这样既可以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重要的物质基础,也可以为城乡共建共享打牢经济发展根基。

第一,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16]作为先进生产力的具体体现形式,新质生产力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可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需要指出的是,发展新质生产力要突出因地制宜,根据各地实情精准施策。具体到城乡融合领域,要以科技创新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此基础上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要以城市群和都市圈为引擎,加快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辐射带动周边地区协同发展,更好地服务高质量发展。鉴于农村仍然是高质量发展的短板,要大力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强化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升农村地区水利、电力、气象、物流、交通等传统设施数字化、智能化水平,缩小城乡“数字鸿沟”。此外,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口,要引导更多资源要素向县域流动,让县域成为厚植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空间载体。

第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迫切

需要,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改革涵盖领域广泛,其中的经济体制改革是重点,而其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就需要破除政府对资源的行政性垄断,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供给,有效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加快促进更高水平供需动态平衡。同时,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更好地统筹消费和投资,增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内源动力。

第三,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是党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认识。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一方面要落实好“两个毫不动摇”的体制机制,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实践充分证明,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推动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才能激活经济发展动能,持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充分发挥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显著优势。另一方面,要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助推社会和谐发展。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针对当前收入分配领域面临的问题,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的前提下,规范收入分配次序,“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17],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4. 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升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抓手

从中央的决策部署来看,脱贫攻坚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底线任务,乡村振兴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引擎。城乡融合发展把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联系起来,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因此,必须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机衔接,使脱贫人口的日子越来越好。

第一,做好机制的配套衔接。我国之所以能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探索出了一套科学有效的扶贫脱贫机制。中央层面制定了目标清晰、责任明确、执行有力的工作机制和考核方案,围绕目标任务层层分解,并逐步予以推进。在此过程中,探索建立了定点帮扶、易地扶贫搬迁、政府间协同扶贫、社会力量参与扶贫等系列长效机制,这样不仅有利于持续化脱贫攻坚目标的实现,还产生了较好的示范效应。当前,为进一步加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之间的衔接,可以考虑将脱贫攻坚实践中形成的较为成熟的机制灵活运用对农村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的帮扶行动中,这样既有利于推广典型经验,又能够防止规模性返贫。此外,要结合新情况、新问题、新要求,进行相应的调整与完善,同时强化部门联动,确保各项机制落到实处。

第二,推动产业融合发展。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石,只有产业发展起来,才能带动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如果没有产业支撑,贫困群众很容易在脱贫后返贫。对于脱贫地区而言,必须立足本地实际,结合现有资源禀赋,选准选好产业项目,打造一批特色农业产业集群。要依托特有农业资源,注重品种品质品牌建设,积极运用现代科技成果改造传统农业,重点支持农业企业向精深加工方向发展,不断延伸农业产业链,推动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如,以农产品加工业带动特色产业价值链提升,着力构建规模种植、综合加工、冷链物流于一体的优势特色产业集群,促进农业与文化、旅游、教育、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积极开发农产品电子商务、生态农业、休闲农业、创意农业等新型业态,夯实富民增收基础。此外,产业融合离不开新型经营主体的引领带动,这就要求加快培育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产业融合主体,构建多样化利益联结机制,让脱贫群众分享产业增值收益。

第三,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城乡融合发展离不开人才智力领航。当下,随着越来越多的青壮年进城务工,乡村对人才的渴求十分迫切,一方面要创新人才激励机制,想方设法把人才“引进来”,特别是要加大政策扶持和宣传力度,

让各类人才在乡村大展宏图。例如,可以为下乡创业者提供税收减免、担保贷款、土地租赁等优惠政策,降低他们的创业成本。不断完善人才下乡激励机制,对在乡村发展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人才给予表彰和奖励,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此外,政府还应加强政策宣传,通过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渠道广泛宣传下乡人才的典型案例和成功经验,让更多人了解并参与乡村建设中来。另一方面,要重视对本土人才的培养。单纯依靠外部引进人才的方式,可能并不能完全满足乡村对人才的需求,在做好人才“外引”的同时,要加强人才的“内培”工作,坚持内外并举、多管齐下,夯实城乡融合发展的人才基石。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N]. 人民日报, 2022-10-26 (01).

[2]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4.

[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4]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四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427.

[5]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65.

[6]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9.

[7] 国家统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EB/OL]. [2023-02-28]. https://www.stats.gov.cn/sj/zxfh/202302/t20230228_1919011.html.

[8] 唐任伍. 中国共产党百年城乡关系探索 [J]. 人民论坛, 2021 (36): 33-37.

[9] 国家统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EB/OL]. [2024-02-29]. https://www.stats.gov.cn/sj/zxfh/202402/t20240228_1947915.html.

[10] 史梦昱, 沈坤荣. 人才集聚、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非线性、共轭驱动和空间外溢效应的研究 [J].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21, 42 (7): 94-107.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

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69.

[12] 习近平在辽宁考察时强调 在新时代东北振兴上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 奋力开创辽宁振兴发展新局面[N].光明日报,2022-08-19(01).

[13] 曹亚斌,刘芳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优势的多维探析[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8(6):10-18.

[14] 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37.

[15] 张晓松,朱基钗.“勇挑大梁、走在前列”——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侧记[N].光明日报,2023-03-06(01).

[16] 习近平.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J].求是,2024(11):4-8.

[17]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统筹做好重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N].人民日报,2021-08-18(01).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and Practical Path of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FAN Genping (School of Marxism,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22, China)

Abstract: The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is a major theoretical innovation generated by the combination of Marx and Engels’ urban-rural integration thought and China’s reality.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strategic measure to guid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urban-rural relations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This strategic move abandoned the drawbacks of western capitalist modernization, fully demonstrated the significant advantages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nd constituted the proper meaning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he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has rich connotations and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In terms of connotation, there are two aspects. First, it is clear that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for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he second is to emphasize that the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is neither “homogeniz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nor “urbanization of rural areas”, nor “elimination of villages”. Instead, on the basis of respect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t emphasizes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unique features of rural areas, allowing beautiful rural areas and modern cities to complement each other, jointly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shared lif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o achieve symbiosis and prosperity. In terms of characteristics, the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is embodied in the essential attribute of the people, which is also the key to maintaining the strong vitality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t this stage, to promote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with the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we must improve the relevant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thoroughly implement the concept of new development, promot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consolidate and expand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effectively link them with rural revitalization, take multiple measures and continue to work hard to achieve the second centennial goal and the Chinese dream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words: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common prosperity; rural revitalization; People first